

見人見物見生活

吳志良

七日談

澳門篇

歷時十五年，十部中國文藝集成志書的其中又兩卷——《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澳門卷》與《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澳門卷》終於正式出版了。二〇一九年以來，我們已經出版了四部，還有六部在編輯審稿過程中。

捧着這兩部沉甸甸的書稿，我腦海中浮現的，不是密密麻麻的譜例，也不是嚴謹周詳的編纂凡例，而是一張張布滿皺紋卻神情專注的臉，一疊疊泛黃捲邊的手抄工尺譜，一縷縷從老街舊巷裏飄出的、如今已難得一聞的粵謳餘音，以及數十位穿街走巷十多年做田野研究、收集資料、悉心編撰的工作者的身影。

有人說，這是一次對澳門民間音樂的「大搶救」。我深以為然。我們多次強調，十部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是對澳門民間文化深入調研、系統整理的最大規模也是耗時最長的一次運動，是對澳門文化DNA的重新認識。但若要我找一個更貼切的詞，我會說，這是一場與時間的鄭重告別，也是一場與記憶的深情重逢。這兩部集成，不是冷冰冰的資料匯編，而是一座用聲音、文字與圖像搭建的記憶殿堂。它所守護的，不只是旋律與唱詞，更是那些附着在旋律與唱詞之上的人、物與生活。

這便是我們做歷史文化研究和傳播時常念及的七個字：見人見物見生活。

先說「見人」。集成編纂啟動之初，編輯委員會便定下一項鐵律：不能只從文獻裏抄曲子，不能只憑二手資料作推斷。一切必須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以親口傳唱為依據。於是，戴定澄教授、沈秉和研究员帶着團隊，多年來穿行於澳門的大街小巷、離島村落、曲藝社、同鄉會。他們拜訪的，不是殿堂級的藝術家，而多是垂垂老矣的普通唱家——鹹水歌的漁婦、南音的地水師

娘、龍舟的走唱藝人。

有一位唱鹹水歌的老婆婆，年輕時在船上討生活，風浪裏練出一把清亮通透的嗓子。編纂人員登門時，她已臥病多時，聲音大不如前。可她聽說有人來記歌，硬是撐着坐起來，一句一句唱，唱到氣喘不止。她說：「我阿媽教落，鹹水歌是海上人的根，根斷了，船就有定向。」那一幕，在場者無不動容。

這樣的故事，書裏沒有詳寫，卻是這兩部集成真正的底色。每一首收錄的歌，背後都立着一個人；每一個人的記憶裏，都藏着一段無法復刻的時代。我們今天說「搶救」，搶救的哪裏是曲子，分明是這些即將隨人遠去的聲音。

再說「見物」。民間音樂的脆弱，不僅在於傳人稀缺，更在於物質載體的散佚。一首地水南音，過去靠的是師娘口傳、曲迷手抄。一本油印的曲本，一盒自錄的開盤帶，一張磨花的黑膠碟，都是孤本，也都是命根。

編纂過程中，許多民間人士主動捐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物件。有位年過八旬的老先生，搬來一隻木箱，裏面整整齊齊碼着六十年前的唱本，封皮上還有他年輕時用鋼筆描的花邊。他說：「我有後人，這些東西跟了我大半世，交給你們，我安樂。」還有一位曲藝社的阿姨，送來一盒上世紀七十年代錄製的南音卡帶，錄音裏依稀聽見茶樓杯盤碰撞、人聲鼎沸的背景音。她說：「那時候冇冷氣，唱到一半，風扇吹走曲譜，大家笑成一團。」

這些物件，有的被翻拍、轉錄入書，有的被數碼化永久保存。它們不再是私人的念想，而成了公共的文化資產。集成附錄裏那些珍貴的手稿影印、老唱片信息、歷史演出記載，正

是這些「物」的無聲訴說。

最終，我們要說「見生活」。民間曲藝從來不是博物館裏的陳列品。鹹水歌是蟹家人搖櫓時的即興對答，龍舟是藝人穿街過巷的謀生技藝，南音是茶客聽曲消遣的日常消閒。它們活在具體的場景裏，維繫着具體的人際情感。若只把譜子記下來，把錄音存起來，卻不思考如何讓它們重新進入生活，那不過是換一種方式的「失傳」。

這正是我們出版這兩部集成更深一層的寄望。

集成不是終點，而是起點。它為研究者提供了扎實的學術基底，為教育者準備了鮮活的教學素材，為創作者開闢了可資借鑒的傳統資源。澳門不少中學的音樂老師，準備開始用集成裏的曲例做鄉土教材；幾位年輕的作曲家，正在嘗試以南音音調譜寫現代劇場音樂；一些社區曲藝社，因為集成出版的契機，重新聚攏了一批老中青會員，周末開鑼，座無虛席。

這不是復古，是再生。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從來不在玻璃展櫃裏，而在人們的口耳相傳、即興創造、日常陪伴之中。當我們不再用「搶救」的悲情去看待它，而是用「生長」的眼光去延續它，民間曲藝才真正找到了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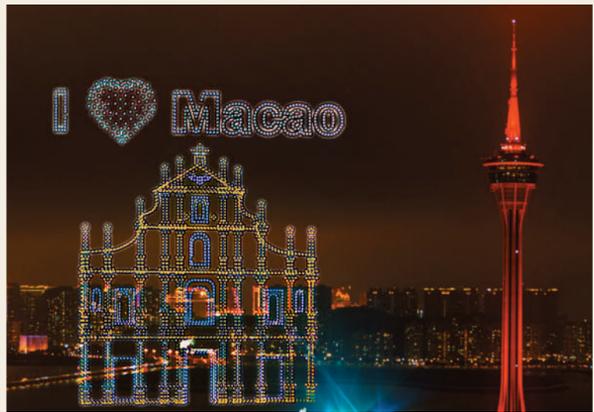
在這意義上，兩部集成像一面鏡子，照見的不是過去，而是我們與過去的關係。它提醒我們：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是傳統的臨時保管者。我們有責任把這份託管之物，完好地、帶着溫度地交給下一個時代。

今夜，澳門街頭依舊燈火璀璨，車流不息。那些曾經迴盪在海濱、埠頭、茶樓、榕樹頭的老調，如今已鮮有人隨口哼唱。但我相信，它們並未消失。它們被寫進書裏，被存入雲端，也被種進一些年輕的心靈裏。總有一天，會有人循着這些聲音，重新唱起屬於這片土地的歌謠。

那時，我們便可以坦然地說：見人，見物，見生活——這七個字，我們做到了。

那時，我們還可以驕傲地說，十部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為澳門留下了一座巍峨的文化豐碑。

那時，我們更可以自豪地說，這座豐碑中，有你、有他、有我盡的一分子，添的一塊磚。



二月二十三日，澳門新春第二場無人機煙花匯演在旅遊塔對出海面上演。香港中通社

回憶錄：在英國劍橋和美國劍橋的經歷(二)



人生在線 陳清泉

劍橋大學學院制的特徵

劍橋採用獨特的「學院制」，三十一個自治學院高度獨立，自行負責招生、住宿和學生輔導。具有以下基本特徵：
• 高度自治：各學院財政獨立，擁有自己的圖書館、體育設施甚至酒吧。

• 風格迥異：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性格」——有的學術極強（如基督學院），有的以運動見長，有的住宿條件優越。
• 雙重身份：學生首先屬於某個學院，然後才屬於大學；學院導師不僅在學術上指導，更負責生活與個人成長。

我所在的邱吉爾學院具有以下特徵：
• 歷史淵源：成立於一九五八年，旨在紀念英國前首相溫斯頓·邱吉爾，並實現他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願景。溫斯頓·邱吉爾曾批評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大學，大意是說：「你們好像在象牙塔裏，培養了好些傑出的科學家，但有沒有像麻省理工學院那樣培養出傑出的工程師和企業家？」
• 理工主導：以理工科見長，學生中理科生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十，已培養出三十餘位諾貝爾獎得主。

• 現代風格：建築以現代和後現代風格為主，擁有劍橋唯一帶表演功能的音樂中心和收藏邱吉爾檔案的文獻中心。

回憶我在邱吉爾學院親身經歷的幾件事，與讀者分享。每位邱吉爾學院的學生都有Tutor或Mentor（導師），學生有困惑時，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和導師談心、解惑。

開學典禮時，場面隆重、壯觀、激動人心，大家意氣風發迎接新學期開始。但是一星期後，有的留學生開始想家、想親人、產生寂寞感，他們可以及時打電話和導師見面，談內心感受，獲得安慰和激勵。有的學生失戀絕望，也和導師分享感受，得到開導。有的學生學習遇到困難，害怕通不過考試，也能從導師那裏學到改進學習的方法，增強克服困難的勇氣。有的畢業班同學在就業上遇到困難，也會請導師指導如何求職、如何寫好求職信、如何寫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簡歷。

國際科技交流樞紐

二〇〇一年，我作為邱吉爾學院院士住在劍橋，除了完成學院交給我的任務外，還在劍橋大學工學院電機工程組講學。二〇〇六年再次到劍橋大學工學院講學，當時的電機工程組主任是Gehan Amaratunga教授。他是在我之後被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和邱吉爾學院院士的，我和他經常交流電力電子領域的發展。

我幾次到劍橋，都收到劍橋中國同學會的邀請，去和同學們演講交流。其中有兩位同學至今還有聯繫，分別是汪之涵博士和聶

贊相博士。汪之涵博士是深圳基本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該公司是第三代功率半導體的領軍企業。聶贊相博士是大灣區新源柔性科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他們開發的柔性電池現在已經進入行業前列。

二〇二三年十月，我又應劍橋大學工學院傑出青年教授龍騰的邀請到劍橋講學，發表了題為「發揚科學精神和工程哲學，能源革命和汽車革命的新征程」的主旨演講。龍騰教授在開場介紹我的時候謙虛地說，他讀大學時就崇拜我，稱我為「亞洲電動汽車之父」，還認真研讀過我的代表性論文。

我之所以頻繁與劍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行交流，是因為心中有一個火種：推進國際科技交流，探討科技的發展方向、前沿和迭代。這和我在二〇一七年創辦國際院士科創中心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要明確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另一方面要構建科技發明產業化的生態鏈。我很高興在主持中國科協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及二十五日於深圳主辦的第五屆世界科技與發展論壇主論壇時，能用五種語言向全世界的科學家呼籲加強交流和團結。

我心中的這個火種，早在二〇〇一年住在邱吉爾學院期間就被點燃了。當時我策劃在上海浦東建立國際高等研究院，終於在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舉行成立儀式並舉辦首屆論壇，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周禹鵬出席開幕式並致辭。在籌備過程中，很榮幸得到時任上海市長徐匡迪院士和時任劍橋大學校長Alec Broers爵士的大力支持。我組織了劍橋大學的六位頂級院士教授到上海浦東國際高等研究院作科技前沿主旨演講，接着又到上海交通大學禮堂向上海高校的學生代表作科普演講。他們是：Gabriel Horn爵士，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劍橋大學政府政策項目主任，曾任劍橋大學副校長和Sidney Sussex學院院長，神經科學專家；Tom Blundell爵士，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英國醫學院院士，醫學專家；Andy Hopper教授，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信息工程專家，八家高科技公司創辦人；Alan Windle教授，材料與冶金專家，時任劍橋-MIT研究院執行主任；Alan Hughes教授，ESRC商務研究中心主任，企業管理專家；Peter Guthrie教授，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可持續發展專家。

在邱吉爾學院二〇〇一年底為我舉辦的歡送午餐會上，邱吉爾學院院長John Boyd爵士在幽默的致辭中說：「陳清泉院士不僅是國際上傑出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教育家，更是傑出的外交家——竟能在短時間內動員劍橋大學六位不同學科組合的頂級院士教授，赴上海成立國際高等研究院。此舉必將對新世紀國際科技合作與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家藏古拓：百年墨香裏的文脈傳承



燈下集 尉劭

古碑拓本承載着厚重的歷史價值與文物意義。那些珍藏於博物館的珍貴古碑，往往遠不可及，而拓本卻能讓尋常百姓與文化愛好者得以近距離觸摸古人智慧，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深邃魅力。我家中便藏有一本祖傳的清代古碑拓本，距今已有兩百餘年，墨香間沉澱着歲月的故事。

這本碑帖長約三十厘米，寬約十五厘米，封面與封底皆為木板裝幀，全帖共四十三頁。與書店裏的印刷品截然不同，頁面上的碑文並非機器印製，而是以宣紙蘸墨拓印碑文後，裁剪成條，精心黏貼在冊頁之上。帖內呈書簡狀摺疊，宣紙因年代久遠已微微泛黃，更顯古樸。

關於這本拓本的由來，父親生前從未詳述，只說是祖上傳下的寶貝，平日妥為收藏，從不輕易示人。父親寫得一手好字，我見他練習書法時，攤在桌上的都是書店買來的字帖，從未動用過這本古帖。晚年他臥病在床，還屢屢問起這古帖是否安好。二〇〇三年初父親離世後，這本碑帖便被我束之高閣。前些時日整理舊物，我才將這塵封已久的拓本重新取出，細細品讀，方知確是珍品。

拓本所錄為兩篇唐代碑文：《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與《大唐故朝散大夫京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銘》。查閱資料可知，兩文分別載於《全唐文》第四部卷與第十部卷，內容主要記述墓主的為官經歷與政績。碑文中的破損缺字處，與拓本完全吻合，足見其確是從原碑拓印而來。經行家鑒定，碑文為唐代原作，拓本則是清代所製。兩文之後，鈐有鄧敬輿的「私印」與「考藏金石記印」；拓本末尾，還有清代著名書法家史鳴皋的題跋，不僅對兩碑加以評點，更蓋有「深心託篆素」印章，寄託着他對碑帖的珍視，為這本拓本平添了許多藝術分量。

史鳴皋與鄧敬輿究竟是何人？他們與我祖上又有何淵源？懷着「懷古尋根」之心，我展開了探尋。

乾隆年間，江蘇如皋東鄉出了位名士史鳴皋，字荀鶴，號笠亭。他於一七五一年（清乾隆十六年）考中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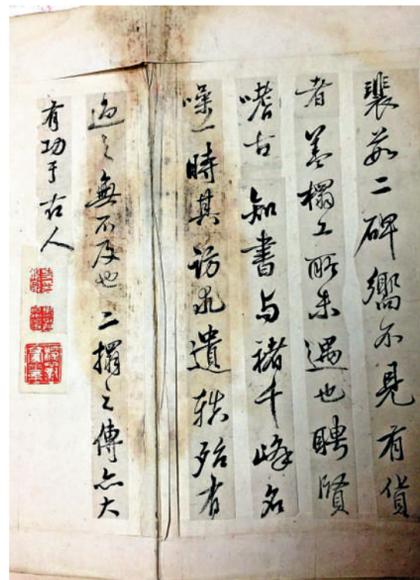
士，官至廣西梧州府同知，曾署理柳州知府。晚年歸鄉後，主講雋水書院，生徒眾多，名滿江東。史鳴皋工詩善畫，七十多歲時離世，其事跡在《國朝畫徵續錄》《淮海英靈集》以及近代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中國繪畫史》中均有記載，評價頗高。

我的家族管氏，是江蘇如東有名的文化世家，位列掘塘歷史上「何、陳、管、顧」四大家族之一，歷代文人輩出。當年，史鳴皋與如東管氏先人交往密切，常一同吟詩作畫、結社酬唱。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如皋管氏宗譜》中，便收錄了史鳴皋所撰的《乾翁管先生七十壽序》《太學生管公乾一暨汪孺人合傳》《管君天申傳》三篇文章。管乾一是管氏如東始祖管重和的第十二世後裔，而我祖父一輩已是第十八世，相隔六代。我的祖父管鮑知，又名管儉齋，是清末監生，在掘塘以經營「管慎盛紙馬店」聞名。所謂「紙馬」，是舊時的祭祀用品，即用木刻版印在紙上的菩薩像，亦稱「菩薩紙」，當年遍布掘塘老街的「紙馬店」，是當地商業的一大特色。《如東民間文化叢書·風物卷》中曾提及管慎盛紙馬店的盛況：「其自製的紙馬品種最全，西郊的幾大園以及附近的農民、市民，臘月『請大發』，絕大多數到該店，遠客還會被留着吃一頓飯。」祖父在經營之餘，酷愛收藏，書畫、碑帖皆在其「雅藏」之列。這本留有地方名士史鳴皋書法與印章的碑帖，無疑是他當年的心頭好，經世代相傳，才得以留存至今。

再說說鄧敬輿，他又名鄧繼，字鳴謙，號飛霞，曾在山東等地任職，工書法、善詩文，才華出眾。據《如東書畫三百年》記載，「其書法名噪京師，時人得寸紙隻字，珍為拱璧。」鄧敬輿是清道光年間人，距史鳴皋的時代不遠。從碑帖拓本上的鈐印來看，「飛霞所得金石」「橫塘千里之居」，前者是他的號，後者是他的齋名，可見這本拓本曾為鄧敬輿所藏。他是如東馬塘人，而我的祖母鄧鳳儀也出身馬塘名門，曾外祖父參加過科考，為附生。至於祖母是否與同代的鄧敬輿有關聯，這本蓋有鄧姓收藏印章的碑帖，祖母一直視若珍寶，寄託着一份特殊的情懷，直至一九六三年她離世。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父親為讓一家老小免於飢寒，曾變賣典當過家中不少值錢物件，卻始終未動過這本古碑拓本的念頭。「文革」期間，父親受到衝擊，住進「牛棚」，家中大量書信、照片、古玩乃至郵票都被抄走，唯獨這本古碑拓本幸免於難，躲過一劫。如今國泰民安，文化繁榮，這本古碑拓本也遇上了好時代，得以讓後人靜心研究、探尋先人的智慧，傳承祖先的文化。

歷經時光流轉、藏家更迭，這本碑帖雖紙張泛黃、略顯陳舊，卻如同一盅陳釀，歷久彌香。如今細細賞玩，其拓工之精妙、墨色之雅緻、書法之佳妙，無不令人愛不釋手。這份傳承，我定會倍加珍護。



▲▲史鳴皋的跋、古拓頁。

作者供圖